

##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党中央权威的维护

邓超 王叶

(北京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875)

**摘要:** 维护党中央权威是党的政治建设的首要问题。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出于统一前进方向、加强自身建设和肃清错误思想行为的需要, 通过在政治上确立毛泽东党中央核心领导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 在思想上加强理论学习, 在组织上巩固对党、军队和群众组织的领导, 在制度上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开展一元化领导体制等一系列措施, 切实维护了党中央的权威。新时代, 维护党中央权威必须维护和提升党的领袖权威、严明组织纪律、加强理论学习。

**关键词:** 延安时期; 党中央权威; 经验启示

**中图分类号:** D1      **文献标识码:** A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肩负着伟大光荣使命的政党。“只有党中央有权威, 才能把全党牢固凝聚起来, 进而把全国各族人民紧密团结起来, 形成万众一心、无坚不摧的磅礴力量。”<sup>[1]</sup>回顾党的百年历史, “遵义会议以前, 我们党没有形成过一个成熟的党中央, 从陈独秀、瞿秋白、向忠发、李立三到王明, 都没有形成过有能力的中央。”<sup>[2]</sup>直到延安时期, 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党的领袖与领导核心相统一的过程, 建立起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 并且在全党范围内采取了一系列系统全面维护党中央权威的举措, 使得党中央在极端复杂和困难的条件下带领全党和中国人民取得了抗日战争的胜利。深入细致总结这一时期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历史经验, 对今后推新时代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意义重大。

### 一、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现实需要

延安时期, 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 国内阶级矛盾降低为次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一方面面临着革命任务和斗争环境的变化, 另一方面要解决党内遗留的历史问题。这时候就需要党中央坚强有力, 能将全党团结起来, 应对重大变化, 解决重要问题。维护党中央权威既是历史的必然也是历史的需要。

#### (一) 领导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

长征结束后, 中国共产党以民族大义为先, 积极倡导、推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上, 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 并且明确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队”, 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 全党要完成党的建设的重大转变。1935年7月至8月, 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 中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发表了《八一宣言》, 强调: “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 “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1937年8月, 党中央在洛川召开政治

局会议，毛泽东明确提出抗日战争是一场艰苦的持久战，红军的战略方针要以“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为主，必须把过去的国内正规战、运动战转变为抗日游击战。1937年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向全国播发了《中国共产党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了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这时，如何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独立自主性成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政治任务和军事战略的转变对全党思想一致、行动一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党中央要统揽全局，协调各方，全党要服从大局，听从指挥。

## （二）发展根据地、壮大党组织的需要

集中统一领导实质上是一种组织上的必然，源自任何复杂组织都具有团结、统一和方向的需求。人多力量大，矛盾困难也多。令全党上下一心，完成中国革命赋予的光荣使命，需要党中央组织有力。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各级组织、党领导的政权、军队数量和党所领导的根据地都得到了空前发展。从党组织自身来看，仅抗战时期，共产党员就由七七事变前的4万名发展到抗日战争前夕的120万名，中央工作机构从15个增加到54个，省（区）委由17个发展到30多个，地、县委以及基层组织遍布全国。从党领导的政权来看，与中央派出机构同级别的边区政府由1个发展到5个，与（区）委统计的政权组织发展到26个。从军队数量方面来看，军队由抗战开始时的4万发展到抗战结束时的120多万，民兵从无到有，发展到260多万，并且建立了19块抗日根据地。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遍及全国各抗日民主根据地和解放区达到18个，根据地辖区近100万平方公里，是中央苏区鼎盛时期的十几倍，人口近1亿。到1948年3月，毛泽东离开陕北时，陕甘宁、晋察冀、晋冀鲁豫、晋绥、山东、中原等解放区大都连成一片，面积达235.55万平方公里，占全国总面积的24.5%，人口1.68亿，占当时全国总人口的35.3%；并占领了57座城市。<sup>[iii]</sup>面对发展的繁荣的景象，彭真说：“今天根据地的党是一个握有政权、军队的，工作范围很大的党。”朱德也认为：“现在人多队伍大，特别要强调集中统一领导。”<sup>[iv]</sup>

1939年10月，毛泽东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中，进一步深化了建设什么样的党认识，目前提出要“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建设目标。党中央有没有权威，直接决定了党是否能够肩负起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艰巨任务；

## （三）肃清党内错误思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的需要

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决不能也决不会容忍任何分裂党，破坏党的团结统一的企图和举动。延安时期，党中央权威受到各种错误的思想和行为的挑战。

首先，分散的游击战争环境里滋生的党内家长制弱化了党中央的权威。1938年10

月毛泽东分析中国国情时所指出，“我们的国家是一个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国家”。<sup>[v]</sup>这一特殊的国情，是党内家长制现象存在的基本前提和重要依据。对此，1941年6月彭真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北方分局向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报告工作，在分析党内家长制现象存在的原因时就认为，“与家长制不可分的，还有党内的独立割据主义，形成‘党内诸侯’”<sup>[vi]</sup>

其次，军事大于政治的非无产阶级思想严重动摇了党中央权威的基础。1935年6月12日，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在四川懋功胜利会师。中国共产党中央根据会师后的形势，提出北上建立川陕甘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然而，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人张国焘自恃兵多势众，不仅不赞成中央的方针，主张南下并在军中散布对中央的不满情绪，甚至要求改组中革军委和红军总司令部。结果张国焘南下受阻，部队伤亡很大。1936年1月22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做出《关于张国焘同志成立第二“中央”的决定》，责令他立即撤销另立的“中央”，停止一切反党活动。张国焘于1936年6月6日宣布取消另立的“中央”，10月9日，红四方面军指挥部到达会宁。至此，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彻底破产。尽管党中央从党的整体利益和革命前途命运出发，以最大宽容一在耐心批评家教育张国焘，但分裂党中央给党给军队造成的损失代价则是惨痛的。

再次，王明从莫斯科回国以后，无视党的纪律，严重违背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1938年2月2日，王明未经毛泽东和中央书记处审阅，擅自起草并发表《毛泽东先生与延安〈新中华报〉记者其光先生的谈话》；1938年2月27日至3月1日，王明在他提议召开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盛气凌人地强调军事上服从国民党统一领导，要求建立真正的“国民革命军”，做到统一指挥、统一编制、统一武装、统一纪律、统一待遇、统一作战计划、统一作战行动；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发表前，到马列学院给师生作报告，反响强烈。王明也跑到马列学院讲《为中国共产党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以图抵消毛泽东讲演的影响。王明的一系列举动严重影响了党中央的权威和党的团结统一，在1938年秋召开的中国共产党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健全党的各级领导机构、加强组织纪律建设，特别是对中央领导层政治生活做出规范成为了摆在全党全会面前的重要任务。

最后，党内“一国三公”现象的发生。1940年前后，多个地区的党政军民学之间，各自为战，协调统一的关系没有理顺，陕甘宁边区的情况尤其突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边区政府对西北局（边区党的领导中心）不尊重，有脱离组织搞独立的倾向。第二，边区军队认为自己是中央的军队，经常不把工作提到西北局去讨论，也不认真执行边区党的决议。第三，政府各部门某些同志不尊重西北局的决定，不认真按照

决定办事。第四，群众团体公开向党要求尊重青年运动的独立性，甚至在有关青年的会议上对党表示反抗，党和政府束手无策。任弼时指出，产生这些现象的根本原因，是由于相关同志对党和一些问题的认识，有着原则上的误区，必须揭发和克服不正确的思想。

##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具体举措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审时度势，高度重视党中央权威的塑造和维护，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使得党实现了空前的团结和统一。

### （一）政治上：确立毛泽东党中央核心领导地位

党中央要有权威，党的领袖必须有权威。列宁曾指出：“在现代社会中，假如没有“十来个”富有天才（而天才人物不是成千上百地产生出来的）、经过考验、受过专门训练和长期教育并且彼此配合得很好的领袖，无论哪个阶级都无法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sup>[vii]</sup>列宁的话有两层意思，一是党的领袖的权威是靠领袖自身对规律的把握、对理论的掌握、实际的组织经验以及其卓越的领导力、敏锐的判断力塑造的。二是无产阶级要善于拥护自己的有权威的领袖以此来进行英勇顽强的斗争取得胜利。

大革命失败后，党的工作转入秘密状态，当时党中央的领袖人物多是知识分子出身，由于农村革命斗争的经验和实际工作能力的欠缺，无法对中国革命的形势和走向作出清晰准确的判断，因而在党内难以塑造自身的权威。同时，错误的党内斗争方式也阻碍了中央领导核心的形成，毛泽东曾评价说：“我党历史上，曾经有过反对陈独秀错误路线和李立三错误路线的大斗争，这些斗争...一方面，没有使干部在思想上彻底了解当时错误的原因、环境和改正此种错误的详细办法...另一方面，太着重了个人的责任，未能团结更多的人共同工作。这两个缺点，我们应引为鉴戒。”<sup>[viii]</sup>此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共产国际的过度干涉，在遵义会议之前党的领袖自决权的空间很小。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核心的形成，需要党的领袖在领导革命中锻炼能力，在斗争实践中树立权威。

1938年六届六中全会召开，这种局面才得以扭转。王稼祥在会上传达了共产国际的决定和季米洛夫的意见：“中国共产党一年来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路线是正确的，中国共产党在复杂的环境和困难的条件下真正运用了马列主义。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机关要以毛泽东为首解决统一领导问题。”<sup>[ix]</sup>随后经过延安整风，广大干部对经验主义、教条主义的危害有了进一步认识，愈加体会到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路线的正确，毛泽东在全党的威望日益提高。

1943年2月，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毛泽东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主席。1945年的4月至6月，党的七大在延安隆重召开，大会高度评价了毛泽东为中国革命作出的历史贡献，指出毛泽东在革命的危急时刻力挽狂澜，挽救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革命实践中探索形成了一整套适合中国国情的

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即毛泽东思想。1945年6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七届一中全会召开，大会“选举毛泽东为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sup>[x]</sup>。毛泽东被赋予党的最高权力，革命领袖和革命导师的双重身份让他拥有了巨大声望和影响力，毛泽东思想也写入了党章，至此，以遵义会议为起点，历时十年，中国共产党完成了党的领袖与领导核心相统一的过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真正建立起来了。

## （二）思想上：加强全党范围内的理论学习完成思想统一

理论学习是中国共产党有序开展，顺利完成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如果全党不加强理论学习，从高级干部到广大党员思想一片混乱，缺乏政治意识、大局意识、看齐意识，维护党中央权威便无从谈起。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效的措施加强全党学习以凝聚人心、提高觉悟和巩固组织。

首先，毛泽东的系列讲话和著作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37年7月至8月间，毛泽东在延安抗日军政大学作了《矛盾论》和《实践论》两篇重要演讲，为全党范围内理论学习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奠定了哲学基础。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1939年10月《〈共产党人〉发刊词》中，他进一步将上述思想表述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相结合”原则，并以此为线索概述了党的整个历史。随后在1940年1月《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科学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

其次，通过创办学校并且由党的高级领导人进行授课，来对党员进行马列主义教育，提高党员的思想认识和理论水平。中国共产党中央党校、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马列学院等学校都是在这一时期创建起来的。“仅延安及周边地区创办的干部学校就达30余所。”<sup>[xi]</sup>1937年，毛泽东来到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给学员们讲授唯物论、辩证法原理，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讲解受到学员们的广泛好评，朱德、刘少奇、陈云等其他中央领导同志也经常来到学校上课。

最后，在全党范围内开展整风运动，实现思想上的统一。延安整风运动的广泛开展，不但消除了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的影响，而且“从根本上清算了建党以来的历次错误，特别是王明的‘左’、右倾主观主义错误”。<sup>[xii]</sup>使全党在毛泽东同志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基础上实现了高度的团结和统一。

## （三）组织上：加强党中央对全党、全军和群众组织的领导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中央对党的各级组织、军队以及党所领导的群众组织的机构建设方面尤其重视。

首先，党的各级组织方面。1935年11月3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西北军事革命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任副主席，这在一定意义上确立了毛泽东、周恩

来、彭德怀等人在军事上的领导体系的建立。1943年3月20日，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通过了《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决定》，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的领袖地位。中央书记处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3人组成。毛泽东任中央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局主席和中央书记处主席。这次会议明确了中央领导机构的职权，同时也形成了中央政治局下辖中央宣传委员会、中央组织委员会和中央民运工作委员会的机构组织模式。这样的模式简化了机构数量，有助于整个组织工作的开展，也顺应了当时精兵简政的要求。

其次，军队组织机构建设方面。1937年7月初，中央作出了《关于红军中党及政治机关在新阶段的组织的决定》，要求改编后的红军，在师以上及独立行动的部队，应组织党的军政委员会，代替政治委员制度。此变化主要鉴于国共合作的原因，其根本目的还是坚持和加强党对红军的单一领导。1937年8月1日，中央组织部作出了《关于改编后党及政治机关的组织的决定》，规定各级党委的基本任务是“领导党的一切工作，保证党在部队中的绝对领导”“依靠党的工作和组织基础，保证上级每一个任务的完成”。另外，1937年10月29日，总政治部发如了《关于地方工作的指示》，要求军队“协助地方党部发展与加强党的组织及领导，无党的地方，部队应负起建立的责任”。此外，为了加强党对整个基层军队的领导，党进行了组织完善。主要有如下四个方面：设立军政委员会、成立联防军政治部、成立各级军队党委会、成立士兵委员会。以上各项措施都是以“党指挥枪”的原则开展并执行的，其中心目的是建立党在整个军队中的控制力，保证党的各项决策在军队中能有相应的机关执行。

最后，在群众组织方面。为了更好的影响与引导群众组织，延安时期党加强了对青年与妇女等群众组织的领导，设立了青年工作委员、成立了民主青年团、完善了妇女工作组织。

与此同时，党坚持了任人唯贤、德才兼备、五湖四海的干部，使党的干部队伍建设获得了较为全买的发展，全党在组织上达到空前的团结。

#### **（四）制度上：坚持民主集中制和开展一元化领导体制**

鉴于党的历史上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的现象，特别是针对张国焘的分裂主义和抗战初期王明严重破坏党的组织原则和违犯党的纪律的情况。1938年9月至12月召开的六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关于中央委员会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规定“中央委员如有错误，除在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内部进行批评外...各委员不得破坏其他委员的威信”，“各政治局委员不得有破坏政治局和政治局其他委员的威信之言论行动”。通过的《关于各级党部工作规则与纪律的决定》制定了党的组织机构和代表大会制度的规则，对各级党委的工作进行了规定，“个人服从组织，少数服从多数，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党的一切工作由中央集中领导，是党在组织上民主集中制的基本原则，各级党的委员会的委员必须无条件的执行，成为一切党员与干部的模范”，“凡党员对党的负责人及党在群众中的领袖有意见与批评时...不得在党内外有任何反对组织反对上级党委的言论行动。”

1943年3月，中央政治局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中央机构调整及精简的决定》则进一步明确了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工作职责，规定在两个全会之间，中央政治局担负起领导整个党的工作，有权决定一切重大问题，凡重大的思想、政治军事、政策和组织问题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讨论通过。书记处是根据政治局决定的方针处理日常工作的办事机关，它在组织上服从政治局，但在政治局方针下有权处理和决定一切日常性质的问题。

七大审议通过的新党章再一次申明“中国共产党是按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是以自觉要履行的纪律联结起来的统一的战斗组织，中国共产党的力量，在于自己的坚强团结、意志统一、行动一致。在党内不容许有离开党的纲领和党章的行为，不能容许有破坏党纪、向党闹独立性、小组活动及阳奉阴违的两面行为”。1948年1月，中国共产党中央发出《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文件要求：“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每月作一次战绩报告、损耗报告和实力报告”，“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sup>[xiii]</sup>。

在军情紧急的战争环境里，党在各方面的这些决定和规则，对于加强党的领导、完善党的民主集中制和规范党的领导机关、领导人的工作程序，进而对维护党中央权威都产生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 三、延安时期维护党中央权威的经验启示

#### （一）确保党的领袖有权威是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核心问题

党中央的权威不凭空产生的，而是在领导全党成功完成根本任务、核心任务、紧急任务，科学正确指出全党全国人民前进方向的过程中塑造的。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唯物史观，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同时也不否定英雄人物，领袖人物在推翻旧世界、建设新世界，推翻旧制度、建立新制度过程中发挥的不可替代的作用。相反，在某一特定的历史时期，需要出现能在关键时刻，解决关键问题的关键人物有力地在全党团结起来，完成更加艰巨伟大的任务。

延安时期的历史经验表明，维护党中央权威的核心问题在于全党有一个坚强有权威的领导核心。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也特别强调确立一个坚强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的极端重要性，他作政治交代时不断指出，中国问题的关键在与要有一个好的政治局，特别是好的政治局常委会。只要这个环节不发生问题那么谁也拿中国没有办法。毛泽东初步提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和看齐意识之后，邓小平又明确提出核心意识。习近平在十八大以后将其归纳和升华为“四个意识”。新形势下，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首要任务在于“两个维护”，“两个维护”是党的团结统一和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为此，全党必须在习近平同志的领导下，自觉坚决果断展开与各种错误倾向的思想交锋和积极斗争，抵制派别斗争、反对自由主义以及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彻底清除宗派主义、圈子文化、码头文化等的恶劣影响。广大党员干部必须不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

## （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是维护党中央权威的关键抓手

延安时期，伴随党的规模日益扩大，不同出身的党员理论水平参差不齐的问题愈发突出。通过开展学习教育，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全面开展了从个体到全体、从个别到普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从理论上总结历史经验、从方法上纠正错误思想，第一次在全党实现了思想统一，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树立了正确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夺取中国革命胜利制定了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形成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只有理论清醒才能政治清醒，只有理论坚定才能保证政治坚定。做到“两个维护”，需要加强理论武装，深刻感悟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伟力，努力掌握蕴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不断收获真理力量，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需要自觉在学懂弄通中涵养战略思维、辩证思维、历史思维、法治思维、底线思维，努力将学习成效转化为清醒的理论认识、坚定的政治信念、科学的思维方法。自觉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党的创新理论为思想灯塔，坚持问题导向，注重“靶向治疗”，廓清思想迷雾，澄清认识误区，常扫思想之尘，筑牢信仰之基，补足精神之钙，把稳思想之舵。

## （三）制定严明的组织纪律是维护党中央权威的重要保障

纪律的制定关键在落实在大是大非问题上。刘少奇在六届六中全会《党规党法的报告》中提出“要保证党的团结与统一，除政治上、思想上之统一外，条纹上亦应规定法律上非团结不可，以避免个别人破坏党的团结与统一，并以此党规与党法去教育同志”<sup>[xiv]</sup>七大上，中国共产党中央把纪律作为党的组织基础写入党章总纲，作为组织纪律的“最高准则”党章规定了中国共产党是按照民主集中制组织起来的，这个战斗组织中的每一位党员都要自觉地遵守党的纪律。党的力量就在于党自身的坚强团结、意志统一、行动一致。任何违背党的纲领和党章的行为都不被允许、不能容许。同时明确了党员的义务和党的纪律，要求党员要“严格地遵守党纪，积极参加党内的政治生活和国内的革命运动，实际执行党的政策和党的组织的决议，和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进行斗争。新时代，全党应严格遵守党章，按党章办事，主动践行党的宗旨，在为人民服务、对党忠诚中践行初心使命。要坚守底线，不妄议中央，远离“雷池”和红线，不传播散步违背党大政方针的言论，不对中央决策阳奉阴违，不泄露党和国家秘密等。

## 参考文献

- 
- [i] 中国共产党中央宣传部:《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87页。
- [ii] 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309.
- [iii] 潘超祥:《党的建设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5页。
- [iv] 朱德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 [v]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vi] 彭真文选[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vii]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1页。
- [viii] 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思想年编:1921—1975》,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8—379页。
- [ix] 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1893—1949(修订本)》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92页。
- [x] 中国共产党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1921—1949)》下,中国共产党党史出版社2011年版,第656页。
- [xi] 谭虎娃:《延安时期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研究》,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66页。
- [xii] 王晓荣:《延安整风运动的历史创造与时代价值》,《人民论坛》2021年第25期。
- [xiii] 毛泽东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 [xiv] 中国共产党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一九二一—一九四九):第1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The CPC's Maintenance of the Central Committee's Authority in the Yan'an Period

Deng Chao and Wang Ye

(College of Marxism,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Abstract:** Maintaining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is the primary issue of the Party's political construction. During the Yan'an period,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ut of the need of unifying the direction of progress, strengthening its own construction and eliminating erroneous ideological acts, adopted a series of measures, such as establishing the central leadership position of Mao Zedong in politics and the guiding position of Mao Zedong Thought, strengthening theoretical learning in ideology, consolidating organizational leadership over the Party, the army and mass organizations, adhering to democratic centralism and developing a unified leadership system in the system. We have effectively safeguarded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In the new era, to maintain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we must maintain and enhance the leadership authority of the Party, strictly observe organizational discipline, and strengthen theoretical learning.

**Key words:** Yan'an period; The authority of the Party Central Committee; Experience enlightenment

**作者简介:**1.邓超 (1997—), 男, 贵州毕节人,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党的建设方向。2.王叶 (2001—), 女, 河南南阳人, 北京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研究生,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方向;